

海岛蓬莱人

王梅晓

我老家在蓬莱的一个小山沟，记忆里有坑坑洼洼的村中小路，有门前粗壮的梧桐树，还有一条大黑狗。妈妈常年下地干农活，哥哥和姐姐去上学，家里只剩我一个小人儿。慢慢懂事了，看见别人家的父母领着孩子去赶集，我会问妈妈："爸爸呢？怎么老是不回家啊？"

妈妈告诉我，爸爸在很远的一个小岛上工作，只有在年节时回家。爸爸每次回来，爷爷奶奶、叔叔婶婶、堂兄弟们都会聚在一起，家里就像过年一样热闹。

后来，从奶奶絮絮叨叨的诉说里，我听到了更多爸爸的故事："你爸爸十七岁就参军了，他勇敢，也幸运，只是在抢救伤员时受了点轻伤，咱村和他一同参军的都没回来……"说到这里，奶奶直抹眼泪，"你爸爸复员转业到地方。后来'蓬长黄'三县合一，他进岛帮助工作；再后来恢复长岛县，他就自愿留在了岛上。"

那时我还小，不懂这些话是什么意思。只知道每次爸爸回来，都会带来鱼啊虾啊的海鲜。我好奇地摸了一下，大虾的须子扎得我手痒痒……

六岁那年，妈妈告诉我，我们要搬家了，要去和爸爸团聚了。

那是我第一次坐船去长岛，在那之前，我从未见过大海，只知道那是爸爸在的地方。

那天，天是阴沉的，海是灰暗的。船开了没一会儿，胃里便一阵一阵往上翻。我趴在船栏上，吐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妈妈和姐姐也都脸色苍白，不敢睁眼。我哭着对妈妈说："我不去长岛了……"

初到长岛，只觉得陌生而狭小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腥咸味儿。在我老家，有数不清的村子，赶大集的时候，人山人海，道两边摆摊的一眼望不到边。这个小岛，感觉没跑几步就到了海边，大街上也见不到多少人。

慢慢长大后，我在南长山岛的"工农兵小学"读书。那里的老师和同学对我很好。一位姓张的老师，说话时带着浓浓的蓬莱口音，让我觉得格外亲切。夏天，同学们结伴到海里游泳，那凉凉的海水轻柔地抚摸着我，那一刻，我觉得海不再是凶巴巴的样子了。

我们住在"医院大院"里，妈妈也和院里的婆婆、阿姨们成了好邻居，不那么思念老家了。可爸爸每天还是很忙，早上我还没醒，爸爸就穿着白大褂出门了；晚上他背着医药箱回来，身上一股药水味。他经常到另外几个小岛出差，遇上大风天不通航，有时半月二十天看不到人。

我最喜欢窝在爸爸怀里，听他讲故事，还有工作中的趣事。我问爸爸："你坐船不怕晕船吗？"爸爸刮了一下我的小鼻子，乐呵呵地说："傻闺女，爸爸1961年就来到了长岛，光那十来个小岛，一年坐船来回也要好几十趟，你算算，这么多年我坐了多少次船啊，早锻炼出来了。"我钦佩地望着爸爸，觉得他太厉害了。

渐渐地，我们也适应了岛上的生活。这个小岛，冬暖夏凉，空气清新。累了、烦闷时，去看看大海，心情就会舒畅许多。

后来，哥哥姐姐相继参加了工作，爸爸忙于业务，妈妈忙着家务。回蓬莱也成了奢望，虽然只隔着一道海。那时，只有我能在寒暑假，像归巢的燕子飞回老家，看望家中的亲人，捎去岛上的特产——海带、海米、妈妈晒的干鱼和自己熬制的虾酱，再带回老家的玉米面、地瓜、苞米皮……我像个信使一般，穿梭在蓬长航线上。

再后来，爷爷去世了，奶奶一个人，身体也不好。爸爸就把奶奶接到岛上养老，以尽孝心。奶奶来了之后，老家的亲戚也会经常来岛上小住一段时间，家里又像过年一样。

我喜欢这样浓浓的亲情，妈妈也会做上一大桌渔家饭菜招待。有一次，奶奶一边抿着鱼刺，一边对我们说："虽然离开了老房子、离开了村里人，但大半辈子没和大儿子在一起，老了老了，能在小岛上享大儿子的福，也知足了……"

工作以后，我曾在北隍城下乡五年。那是山东最北端的一座小岛。光坐船就要四五个小时，可再大的风浪，我也不怕了。看着同事晕船难受的样子，我想起爸爸说过的那句话——坐船坐多了，就真的不晕船了。

记得岛上有个大嫂子问过我："闺女，你是砣矶岛人吧？"我一听就乐了："岛里有好多大娘大爷也这样问过我呢。俺娘家在南长山岛，婆家是大钦岛的，可俺是正宗的蓬莱闺女啊！从前是'地瓜干子'，现在也变成'烤鱼片'了。俺是嫁给了长岛人，也爱上了这个地方。"

大嫂子也被我逗笑了："是啊，过去蓬长是一家，蓬莱人和长岛人性格一样，都是善良实在啊！"

在北隍城岛的日子，不是想象中的浪漫。冬天，有凛冽的寒风、滔天的巨浪；停航的日子，肉菜运不进来，我们把食堂冰柜里的咸鱼都吃个精光。夏天海边潮湿，宿舍里的被褥都是湿乎乎的。那会儿生活条件艰苦，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。想起爸爸当年在一个个小岛上奔波，背着药箱一家家地跑。如今我也踩着爸爸的足迹，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岛上。

在长岛工作的这些年，我待过好几个单位。幸运的是，每个单位都有我们蓬莱人。同事们聚在一起互相打趣说："长岛的发展变化，离不开我们这些蓬莱人的奉献啊。"话虽是玩笑，可心里也真觉得，我们把根已经扎在了这里。

看到长岛从刚来时的"一条马路六盏灯，一条客船常避风……"变成现在楼高了、路宽了、船也大了快了……环境美了，生态好了，鸥鸟翻飞，住着也更舒心了。

转眼在岛上过了几十年，像看着一个孩子慢慢长大一样。如今，长岛的蓝天碧海、一岛一礁，早已溢满心田，和骨子里蓬莱那个小山村的一草一木紧紧交融在一起，再也割舍不断。

爸爸从单位离休以后，每年都要回老家几趟。我也经常带着爱人，回到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，走一走，看一看。时光流逝，有多少往事都已渐渐遗忘，唯有故乡那个小村庄，还有我的爷爷奶奶、叔叔婶婶，儿时的小伙伴们，常常在梦里出现。

如今，爸爸已是九旬老人，身体大不如前，不能经常回老家了。但他可以和老家的亲人视频，不用再坐船过海，就能聊聊家常。

从视频里看到，从前老家坑坑洼洼、雨后泥泞不堪的小路，在实施"村村通"后，已经变成平整的水泥路；低矮的小平房，也翻盖成了宽敞的大瓦房。以前我们还把不穿的旧衣旧鞋捎给亲戚们，现在他们穿的比我们都时髦。视频聊天时，老家亲戚也会晒晒餐桌上的美食——新鲜的鱼虾不光我们岛上有，他们想吃就能在集市上买到。

堂兄弟们说："大爷爷岁数大了，不用来回跑了。你们岛上的豪华游轮，坐着又快又舒服，也不晕。我们小辈也可以去岛上看望大爷爷了。"

老爸听了，笑了笑，对我说："小闺女，明年春天，天气暖和了，你和小女婿再拉着我回趟老家。我想家啊……"

我站在大海边，望向蓬莱的方向。那大海一望无际，浪花飞舞，涛声阵阵，像一位老奶奶在给远归的孩子讲那古老的故事。

秋日的村庄

姜惠泉

每次回老家，我总爱在周边的村庄逛一逛，今年也不例外。

金秋十月，我和爱人特意从烟台赶回老家，参加她表弟女儿的婚礼。婚礼过后，爱人要留下来陪伴年迈的母亲，我闲来无事，便常常穿梭于周边村庄。

每次走进村庄，最先撞进眼帘的，总是柿子。火红一片，高高挂在树梢，像谁把一盏盏小红灯笼点在了秋风里，也像把"柿柿如意"悄悄挂上了枝头。石榴也不甘寂寞，鼓着红红的腮，一副富态相，有的树还被修剪成"宝瓶"模样。枣树则低低地探向路边，紫红的小枣缀满枝头，风一过，轻轻颤动，像在跟人打招呼。

看着眼前这美丽的乡村景象，我总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的村庄。那还是20世纪70年代。村里的房子都矮，屋顶铺着麦秸秆，风吹日晒久了，黑乎乎一片。墙壁大都是用黄泥垒垒的，老旧房屋的墙面被雨水冲出一道道沟壑，像老人饱经沧桑的脸。街道坑坑洼洼，胡同弯弯曲曲，像一座巨大的迷宫。

村里哪有几棵枣树、几棵石榴树，我们小孩子都一清二楚。那些没人住的院子里，枣和石榴从没等到成熟，就被我们摘得干干净净。

那时候，村里有两棵大枣树最为有名。一棵在洪山家老宅，宅院空置，又挨着学校。枣花一开，我们这群皮孩子就开始惦记上了。花刚落，小枣还没花生米大，我们就爬上树摘。放进嘴里，硬邦邦的，一点甜味也没有，却还是摘得兴高采烈。

另一棵在老六家。老六家兄弟七人，个个身材魁伟，孔武有力，在周边几个村赫赫有名，但他们从不欺负别人。我八九岁时，跟伙伴去偷枣。见老六家大门紧闭，便顺着石头墙往上爬。刚骑上墙头，老六出来了，我们吓得跳下墙，等着挨骂。他却只说了一句："你们两个从来没来过吧？"说完，自己爬上树，摘了一大把枣塞给我们。上次回乡，我在他家门口遇见他，他正在剥玉米，提起这事，他笑了笑，像是早已不记得了。

除了枣树，还有我三奶奶家的两棵石榴树，每到开花时节，它们就像两团燃烧的火焰，把半边院子都映红了。

三奶奶神志不太清楚，院墙也早塌了。石榴一开花，就有人趁她不在掐花玩；果子还没长到鸡蛋大，又被人摘个精光。那石榴又酸又涩。可那些没经历过连吃饱饭都成为奢侈年代的人，大概不懂这些恶作剧背后藏着的心酸。

后来三奶奶被姑姑接到沈阳，房子空了下来。我们把它修葺一新，搬进去住。那两棵从没好好结过果子的石榴树，竟一年年挂满咧开嘴的红石榴，又圆又大，酸里带甜，每年能结一百多个。

再后来，日子好起来，钱包也鼓了。红砖瓦房一栋栋盖起来，路宽了，胡同少了。我离开老家到烟台生活，至今已经三十多年。

前几年回老家，见熟透的柿子落在地上，石榴咧着嘴淋在雨里，紫红的大枣晒在太阳下也无人摘。我奇怪地问姐姐："街上这么多柿子、石榴，怎么没人摘？"姐姐说："都吃够了，不稀罕了。"

可我每次看见满树瓜果，闻到阵阵飘香，心里总泛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：说甜，又有一点酸；说酸，又终究带着甜。这就像三奶奶家那两棵石榴树，从前结的是酸涩，如今结的是酸甜。

我依旧爱到周边村庄去转一转，看一看。看看柿子红没红，摸摸枣树粗了多少，在某个巷口站一站。仿佛这样，就能和从前的日子打个照面。